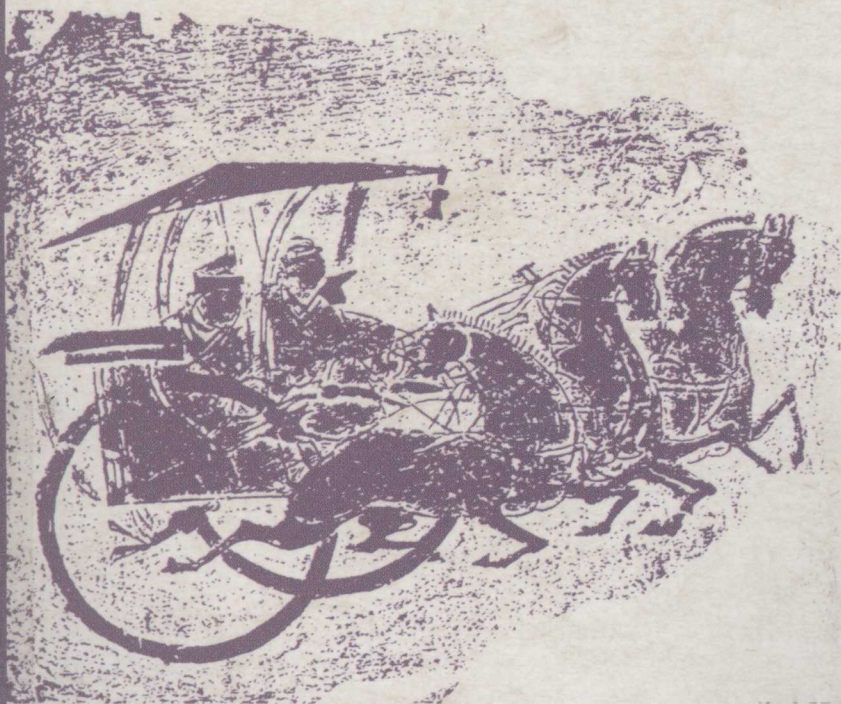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解读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黄朴民 撰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孙子兵法》 解读

黄朴民 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子兵法》解读/黄朴民撰.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808-1

I. 孙…
II. 黄…
III. 孙子兵法-研究-教材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834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孙子兵法》解读
黄朴民 撰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1.75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9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以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圇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于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年6月

目 录

导言	1
计篇	32
作战篇	54
谋攻篇	74
形篇	96
势篇	113
虚实篇	132
军争篇	156
九变篇	177
行军篇	193
地形篇	217
九地篇	238
火攻篇	271
用间篇	289
附录一 孙子本传	310
附录二 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	311
附录三 历代名家评《孙子》	320
主要参考书目	335

导 言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这句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出自中国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孙子兵法》（亦称《孙子》）。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许多合理内核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已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一、《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曾有分歧的意见，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亦称孙子、孙武子）还是孙臆？抑或如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①？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孙子兵法》一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

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兵法》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它的作者也难以肯定是孙武,而当为其门人或再传弟子。有的学者则更断言是作者为战国中期的孙臆。^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臆的记载相吻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臆各有其人,《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臆。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涣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兵法》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②

我们认为,《孙子兵法》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兵法》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孙武曾著有兵法,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兵法》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兵法》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臆,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臆,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① 参见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见《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李丕基:《孙子十三篇释疑》,载《新东方》第2卷第3期;钱穆:《孙武辨》,见《先秦诸子系年》(增订本),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

② 参见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载《文史》第7辑;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见《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等文。

这里三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兵法》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繚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兵法》内容基本一致。^①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兵法》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臆为一人，或以为《孙子兵法》成书于孙臆之手，凡是种种，多属臆测之辞。因为仅凭借《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兵法》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在《诸子辨》中即有反驳。其要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至于混淆孙武、孙臆为一人，或言孙臆作《孙子兵法》，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无须赘说。

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兵法》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来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来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而言，即是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的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②。《孙子兵法》与“古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

^① 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见《孙子新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②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①，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画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一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基本宗旨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612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孙子兵法》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兵法》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因此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兵法》一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焚舟破釜”等句颇可怀疑系后人窜入；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其书主体部分成书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

二、《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及版本

1. 关于《孙子兵法》的著录与流传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兵法》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

^①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所附残简。

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其为“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

西汉时期是《孙子兵法》一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初“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①。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②。颜师古注云：“捃摭，谓拾取之。”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③。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兵学代表作《孙子兵法》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兵法》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④。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兵法》。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兵法》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兵法》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臆）”。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原因不外乎二：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人们对《孙子兵法》不断增益，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我们认为，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故三国年间曹操注《孙子兵法》，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⑤，汲汲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

曹操之《孙子注》，系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其注为

①②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③ 《汉书·艺文志序》。

④ 《隋书·经籍志》。

⑤ 《孙子注·序》。

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录》著录《孙子兵法》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兵法》的主体。曹操注《孙子兵法》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兵法》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兵法》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尊崇有增无减，学习《孙子兵法》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当时统治者感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军事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正式将《六韬》、《孙子兵法》、《吴子》、《三略》、《尉繚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诸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兵法》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①。

与此相应，对《孙子兵法》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兵法》作注者不下于二百余家，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在隋唐时期有孟氏、李

① 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筌、陈皞、贾林、杜佑、杜牧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皙、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2. 关于《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

《孙子兵法》一书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穷本溯源，不外乎三大系统：(1) 竹简本；(2) 武经本；(3) 十一家注本。

竹简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兵法》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要早数十到上百年。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①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兵法》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究并非完璧。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兵法》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②。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孙子兵法》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原为嘉兴陆氏皕宋楼藏书，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在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兵法》一书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相对而言，十一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与武经本有一定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但年代更早，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十一家注本为少。^③历史上武经本系统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金施子美《武经七

① 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见《孙子新探》。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题解》。

③ 参见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4）。

书讲义·孙子》、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明黄献臣《武经开宗·孙子》、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它也是传世《孙子兵法》一书中的最重要版本之一，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兵法》一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①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兵法》集注本，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风行。这种状况，一直到清代孙星衍手里才加以改变。当时他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声誉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孙子兵法》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三、《孙子兵法》成书的历史契机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武之所以“显名诸侯”，名于当世，是因为他辅佐阖庐“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然而，在今天，孙武之所以在军事史上享誉中外，名播千秋，则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虽然只有六千字左右，但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它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及详备富赡的内容，书中充满了对智慧的赞扬，饱含着对昏聩的鞭挞，显示出对穷兵黩武的警告，贯穿着对军事哲理的探索。这是一部从战略高度论述军事问题的不朽之作。

那么，为什么在东方，在中国，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能够产生《孙子兵法》这样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我们认为，社会文明的演进，战争方式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激荡，地域文化的孕育，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个人实践的折射，所有这一切，都是《孙子兵法》诞生的历史契机。^②

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习惯上所称的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

① 参见杨丙安、陈彭：《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载《文史》，1986（17）。

② 参见拙著《孙子评传：一代兵圣的生平与思想》，第1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过渡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向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展开斗争。其中在政治领域内，战争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他们为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都高度重视对战争经验的总结，急切需要有本阶级的军事学家为自己提供从事战争实践的理论指导。从这层意义上说，孙武撰著《孙子兵法》，乃是时代的要求。

尽管诸侯列国都在研究战争，培养军事人才，但是相形之下，哺育孙武成长的故土——齐国，却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它最终成为培育一代兵圣的摇篮。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境内，具有悠久的历史。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立国伊始，即推行正确的治国方针，奠定了齐国长期强盛的基础。而齐国开放、发达的社会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文化具有注重实用和兼容博取的两大突出特点。^①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因此它在齐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姜太公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辅佐周武王剪灭商朝，在战争实践方面功业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太公兵法》虽早已失传，但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它的核心是“多兵权与奇计”，因而“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作为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司马兵法”的发明与总结，也与姜太公和齐国兵家有直接关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载：“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由此可见，他是中国历史上军事理论建设的重要奠基者。

姜太公初步确立的齐国兵学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条件的变革而得以弘扬和光大。由于各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中相对比较弱小。所谓“齐兵素号为怯”，“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②，就是例证。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重兵学理论方面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著名的军事家在齐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精彩的军事理论著作也纷纷面世。在春秋战国之际，出自齐人之手的兵法著作除《孙子兵法》外，还有《管子》、《司马法》、《六韬》、《孙臧兵法》、《子晚子》（今佚）等。这表明，兵学是齐国整个学术文化体系中极具特色、富有影响的重要构成部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① 参见拙作《齐文化与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载《学术月刊》，1997（10）。

②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荀子·议兵篇》。